



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將隨近期俄烏戰爭的演變，而決定日後兩國的合作態勢。圖為2018年6月8日蒲亭訪「中」的迎賓儀式。(Source: Reuters/達志)

● 作者/Michael Schuman ● 譯者/張彥元 ● 審者/洪琬婷

「中」俄關係發展

China's Russia Risk

取材/2022年3月14日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專文(*The Atlantic*, March 14/2022)

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向來跌宕起伏，而當前兩國國力已有顯著差異。在近期俄烏戰爭中，中共是否能抓住機遇而成為國際事務中具建設性的參與者，或許會是這場戰爭最為深遠之影響。



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，習近平原本可能透過與蒲亭(Vladimir Putin)關係升溫而讓中共得到更大的利益。當時蒲亭這位俄羅斯領導人正在對抗美國勢力，造成美國與其歐洲盟邦關係緊張，並騷擾烏克蘭這個年輕的民主鄰國。這一切對中共而言幾乎沒有造成任何其他損失。或許只是臆測，蒲亭甚至可能為習近平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(奪取臺灣)預先鋪路。

然而，自戰爭開始以來，中共與蒲亭之間夥伴關係的處處陷阱已然暴露無遺。美國的聯盟網路重整旗鼓，共同對俄羅斯實施極具破壞力的制裁。北京方面則採取其慣常的作法，在各方之間踢踏搖擺，貌似中立，但卻讓自身在世界大國間成為局外人。各國都清楚習近平支持哪一方，所以其立場使中共與強化的跨大西洋聯盟更形疏離。

這些矛盾狀況應已不足為奇。早一個世紀前共產黨於中國大陸甫成立初期，其與俄羅斯間的關係便時而充滿無窮前景，但也經常陷入危機險境。今日亦復如此。

中共和俄羅斯之間表面關係的改善，使華府安全專家擔憂，美國將必須與世界上兩個最強大威權國家所組成之邪惡聯盟抗衡，這兩個國家決心以對其有利方式重塑全球秩序。如此陰謀詭計可能會帶來艱難的戰略挑戰；正如蒲亭入侵烏克蘭之悲劇所示，一次對抗兩者之一已十分困難，倘若美國須因應中俄共同對美國全球力量發起突襲，則情況會更為複雜。北京與莫斯科可互相幫助以規避美國制裁，從而剝奪華府之影響力。他們反美的可能性將永無休止。

然而，由於雙方難以互信，在冷戰期間，中共和

俄羅斯並未能把握聯合對抗美國的機會；意識形態之爭、雙方領導人對立以及野心相互衝突，導致彼此相殘。今日，中共和俄羅斯利益亦非完全一致；事實上，兩國很可能會走向不同的未來。

關鍵在於，中共對俄羅斯的關係正成為試金石，驗證北京希望在上演何種角色。中共一再聲稱其支持「和平共處」與結束分裂的「冷戰思維」。然而，由於蒲亭不合時宜地尋求恢復往日蘇維埃帝國榮景，習近平卻加以支持；即使此舉是被動為之，也讓其看似另一位成形中的獨裁者。因此，北京如何處理與莫斯科之間關係，將有助於定義中共的大國形象。

近數十年來，中共於世界的地位深受「中」美關係影響。但從許多層面上來看，「中」俄關係在編寫現代中共歷史方面，無論是正面或是負面影響，均同等重要。

這兩個共產政權關係的開端並不順遂。1949年12月，中國大陸內戰結束，並且在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成立僅兩個月後，毛澤東登上武裝列車，專程赴蘇聯拜會史達林(Joseph Stalin)。這位貧困的懇求者端著恭順謙卑態度，面對共產世界無可爭議之指導者。毛澤東承繼了一個飽受戰爭蹂躪之國家，迫切需要金錢、技術與國際上的支持。蘇聯的協助對於中共政權存亡至關重要。當兩位領導人會面時，毛澤東向史達林提出幾乎涵蓋一切所有的要求，包括同盟條約、財政支援、軍事援助，甚至請求史達林協助編輯自身著作。史達林雖然抱持鼓勵的態度，但對一切要求卻未置可否。他將毛澤東安排在莫斯科郊外鄉間別墅，而拖沓的討價還價則持續了數週。1950年2月，



毛澤東決定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，以抗衡蘇聯核武威脅。圖為共產製「紅旗L9」國賓用車，曾於1972年接待尼克森總統。(Source: AP/達志)

毛澤東終於在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》上簽字，但其中令人備感羞辱之條款，卻讓人想起帝國主義列強於19世紀強加於中國、引人反感的「不平等條約」。

儘管如此，蘇聯還是提供了龐大的援助。歷史學家文安立(Odd Arne Westad)在其著作《全球冷戰》(*The Cold War: A World History*)中寫道，如此奧援規模讓「世界各地任一國家級計畫皆無法與之媲美，更超越了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

畫」。蘇聯顧問訓練中共軍官並協助規劃中國大陸城市。史達林死後，莫斯科對中共的熱忱有增無減；繼任者赫魯雪夫(Nikita Khrushchev)認為，中共會是共產主義最終戰勝西方之關鍵。

然而，在1950年代後期雙方關係開始分裂。在共產黨階級制度中，毛澤東逐漸不甘於屈居人下，因而在經濟和外交政策上，與莫斯科分道揚鑣。對毛澤東而言，蘇聯受「右傾思想」左右，而這是共產主義術語中

鬥爭用語之一。1969年，雙方的邊境衝突幾乎升級為全面戰爭。蘇聯威脅使用核武，而毛澤東也擔憂有此可能。隨後經過談判，雙方緊張態勢得以緩和，然而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激烈對抗，促使毛澤東做出了一個改變歷史之決定：於1972年與尼克森(Richard Nixon)總統會面，並與中共所稱帝國主義壓迫者的美國和解。

近年來，歷史重演；隨著與華府緊張關係升級，北京與莫斯科的關係則日益增溫。習近平稱蒲亭是他「最好的朋友」；2022年2月，雙方在北京冬季奧運前夕會晤後，宣告兩國友誼「沒有止境」。許多因素讓雙方愈走愈近。例如在經濟上，雙方是彼此互補的夥伴。對中共而言，俄羅斯是重要原物料供應國，而俄羅斯則需要中共的投資和高科技產品。兩國間貿易額僅2021年一年即增加36%，達到1,470億美元，而且雙方亦共同開發商用噴射客機等專案計畫，與波音公司和空中巴士集團競爭。

然而，據卡內基莫斯科中心(Carnegie Moscow Center)



高級研究員陳寒士(Alexander Gabuev)表示,「反美是『中』蘇建立新友誼的秘密配方」。習近平與蒲亭共同的目標是將美國影響力外推遠離其邊界,並瓦解美國在他們各自所處區域之同盟關係。正如蒲亭擔憂北約愈來愈逼近俄羅斯,習近平也因受到美國在亞洲的夥伴國網路所包圍而備感壓力。在他們企圖重新制定全球地緣戰略版圖過程中,持續共同施加美國在歐洲和亞洲所面臨的壓力,將可分散華府注意力與資源,

並散播美國難以履行其全球承諾之疑慮。兩國間貿易與投資愈多,就愈不容易受到美國經濟制裁影響。如果兩國真如彼此所承諾,以各自貨幣進行貿易與投資,或許甚至可以擺脫美元強大的束縛。

但有很多因素不證自明,上述情況幾乎不會發生。最根本原因是兩國的發展方向相悖。蒲亭所主掌的是一個正在衰落中之國家,缺乏經濟活力以維持其政治影響力。他能夠承擔向美國所領導的全球體系扔出一

枚手榴彈之後果。然而,中共則自詡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,而其崛起(至少在目前)仍然與世界秩序息息相關。習近平與蒲亭相同,也希望改變這個體系,然而習近平承受不起太大的破壞。中共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,倘若習近平引發任何動盪,都可能會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陳寒士指出,中共「要盡其可能地透過參與全球經濟與供應鏈而受益」。他補充說明,對中共而言「描繪出『大國』實際意涵,與蒲亭狂熱地執著於征服烏克蘭相比,其領導人必須更加務實、更少情緒、更有遠見,且更為長遠」。

隨著中共國勢日強,雙方利益上之差距可能更形擴大。陳寒士表示,習近平「期望透過科技實際主宰俄羅斯經濟,將其整合納入為『中華治世』(Pax Sinica)中的一個從屬夥伴國,在形式上尊重俄羅斯主權,但其外交政策與經濟更順應中共外交政策目標導向。中共目前還沒有能力迫使俄羅斯就範。但是10年或15年後則完全無法同日而語,而這也正是俄羅斯的風險所在」。



2022年4月5日,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以視訊方式,參加聯合國安理會俄烏戰爭相關會議,並譴責俄羅斯軍隊濫殺平民一事。(Source:AP/達志)



面對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，中共為求自保，決定暫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俄羅斯的相關業務。圖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。(Source: Reuters/達志)

由此觀之，蒲亭與習近平雙方友誼，或許也和其各自與華府的關係一樣危險。隨著烏克蘭情勢的發展，如此情形可能會漸漸浮上檯面。

在某些方面，雙方的夥伴關係漸有回饋。蒲亭從習近平之處獲得寶貴的外交支持，而北京則認為，莫斯科在對抗民主上，表現出色、貢獻卓越。

然而，習近平對「最好的朋友」出手相助也僅止於此。北京已然在蒲亭的安全顧慮與戰

爭之間劃出了界限，雖然稱如此顧慮合情合理且並未譴責戰爭，但也並未明確予以支持。在聯合國安理會就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提案投票中，中共棄權。

上述情況部分的成因是來自於意識形態。中共主張國際關係應以「不干涉」他國事務為基礎。「入侵」是最為嚴重的干涉，因此蒲亭發動侵略使習近平的外交地位尷尬。中共官員也在有關烏克蘭的發言中，

一再強調尊重國家主權之重要性。

非僅於此，中共自身國家利益亦將限制習近平提供支持的程度。例如，儘管北京反對他國針對俄羅斯實施制裁，並可能會想方設法協助蒲亭逃避制裁，但中共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，無法承擔自身遭到制裁的風險。國際制裁公布後，中共國營銀行開始限制購買俄羅斯大宗商品之信貸額度。中共支持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暫



習近平與蒲亭之間的關係，很可能僅是各取所需，而隨局勢發展，中共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也將被重新定義。(Source: AP/達志)

停與俄羅斯有關之活動。2022年2月，凱投宏觀公司(Capital Economics)的首席亞洲經濟學家威廉斯(Mark Williams)在一份報告中寫道：「中國很可能會在西方制裁所允許範圍內，透過金融與貿易等方式支持俄羅斯。中國大型企業與官方部門不會冒風險去加深與西方關係的裂痕」。

這也正是有待驗證之處。就根本而言，中共的優先要務永遠是中共自己。到目前為止，北京仍堅稱其與莫斯科的友誼「堅若磐石」，但其對莫斯科(或對任何國家)之援助是建立

在不會對中共原定計畫造成損害之上。這意味著習近平與蒲亭之間的親密關係，可能仍僅是各取所需。這個雙人搭檔仍可能會為美國與其盟邦帶來許多麻煩，但雙方可能難以實現真正的同盟，無法建立類似美國與日本或英國之間，各方願意實際協調行動與政策之同盟關係。

蒲亭也幫了習近平一個大忙，他讓中共一窺獨自發動戰爭所可能發生的情況。蒲亭入侵之舉已顯示，迥異於北京領導層原有認知，美國之同盟體系其實仍舊活躍、運作良好，並

且仍然有效。對國內穩定念茲在茲的中國共產黨，或許會對俄羅斯受到制裁之程度感到惴惴不安，並且開始評估其忍受同等制裁所須付出的代價。許多評論者原本預測，烏克蘭危機可能是中共對臺灣發動軍事襲擊的前兆。然而到目前為止，情況可能剛好相反。

現在的問題是，習近平會如何反應？烏克蘭政府已直接籲請中共利用其對蒲亭的影響力來結束戰事。據吾人所知，北京方面一直未置可否。所以，習近平正面臨一個重大抉擇：他可以抓住這個千載難逢機會，扮演全球好好先生的角色，代表烏克蘭介入危機，在此過程中緩解美「中」對抗，並使中共成為在國際事務上具建設性之參與者。或者，他可以繼續與蒲亭站在同一陣線，並追求其削弱美國實力的長期目標。

或許，俄烏戰爭影響最為深遠的結果，將是定義中共在世界所扮演之角色。

版權聲明

Reprint from *The Atlantic* with permission.